

思想作为救赎：柏拉图与 奥古斯丁之间的普罗提诺^①

Thinking as Redemption: Plotinus between Plato and Augustine

汉斯·乔治·伽达默尔 著 杨 钧 译

Hans – Georg Gadamer

[英文提要]

Plotinus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Neo – platonism. His personal life and spiritual pursuit reflected the unique temperament of late Antiquity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in its infancy, e. g. his religious zeal, his longing for the world beyond, his discipline of the senses and the spirit, and his desire for transcendence. Plotinus was no mystic, but a serious and deeply reflective thinker of his time. Having internalized the great tradition of Greek philosophy, he was able, in the name and language of Plato, to give thoughtful rational expression to man's need for redemption. The thought of Plotinus shaped the entire tradition of Platonism from then on until very recent times. Through him, Greek philosophy was brought ever so close to Christian truth.

普罗提诺不在人们热衷讨论的哲学巨人之列。他无法与那些伟大的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① 本文译自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宗教和伦理学》一书，第 76 – 90 页，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译者注

等量齐观,也难与基督教思想家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比肩,甚至也不及现代的思想家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他是希腊裔的古罗马晚期思想家,在凯撒时期的罗马教授哲学,在那里人们都讲拉丁语,希腊语只是一种有教养者使用的语言。单从这方面看,尤其是当人们了解到他设想自己完全不是为了传播真理而是为了弘扬柏拉图的思想时,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他似乎是一颗奇怪的星座。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他是否属于我们要估量的思想家的最前列,如果有许多人将他列入其中,我们要问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称他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这当然不是指他只是具有这样头衔的许多人中的一个,相反,他是新柏拉图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至今保存完好,而且我们已有关于他的生平的完整而可信的材料,几乎没有其他古代的思想家可与之相比——除了苏格拉底,他的形象是由柏拉图和其他友人弟子描绘出来的。我们对于普罗提诺的知识由于他的学生波菲利的传记而得以流传至今。

但是这一情形事实上并非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偶然事件。当然,在哲学中传统在传播其影响时似乎是不公平的。不用多说即很明显的是,我们对于德谟克里特这样一位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古代原子论的奠基者,对现代影响深著的伟大思想家几乎一无所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希腊晚期有决定性的影响,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文稿能够流传下来。

倘若是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主义决定了后继的时代,那么德谟克里特的著作——据猜测有数百卷之多——就可能已保存下来,而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保存在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无疑他是一个德谟克里特的崇拜者)的图书馆里的尚未破译的赫拉克勒斯古卷(the papyri of Herculaneum)到现在仍然令人惊

奇，因为它很可能改变我们对古希腊哲学的想象，而进入其本质。然而那将是一个偶然事件。它将像文物或废墟一样被保存下来。传统终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涉及意愿和行动，而仅非偶然的事件。

还有，斯多噶学派的伟大奠基者——芝诺(Zeno)、克律西波(Chrysippus)和波塞多纽(Poseidonius)——只是我们略有所知的人物，这也表明在多大程度上命运决定了传统事件。事实上可能总是一些别的东西而仅非偶然事件决定了历史的记忆，这在普罗提诺那里得到明证。一个处在世界中心的罗马帝国的哲学家，他没有生活在也没有任教于曾经诞生过许多不朽的哲学流派的地方——我是说雅典——这对于处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会产生什么意义呢？生活在一个走向末路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呢？就其生活方面，我们已知他与凯撒宫廷成员以及罗马贵族的上层都过从甚密，显然是他高贵的领袖气质赋予他这样的特权。但是他经世不衰的声名却另有原因。柏拉图被称为“*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一个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的灵魂。这种描述对于普罗提诺也许更为恰切，因为他一生的现实与精神追求反映出古罗马晚期和早期基督教世界的独特气质：向往彼岸世界，严肃对待感官和精神，超脱现世，对宗教充满热情。在几个世纪中与彼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名字相连的古老宗教传统曾掀起了多次狂热的宗教运动，魔术、奇人、奇迹和占星术都找到了对之臣服的灵魂。当我们思考到这样的奇迹创造者和巡回传教士时我们会提及新彼达哥拉斯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而普罗提诺则完全是另一类人。他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深入反思的严肃的思想家，他吸收了希腊哲学的伟大传统，以柏拉图的名义并在他的影响下对于那个时代的救赎要求给予了深入的理性表达。

然而真正使他对俗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原因在于他的著作通

过马修·维克多瑞纳斯(Marius Victorinus)等人的翻译而为早期基督教思想所知。这就不仅仅意味着由基督教会所继承的希腊遗产由于古罗马晚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的加入而得到丰富,而且意味着早期教父是通过普罗提诺的眼睛来看伟大的希腊哲学经典的,尤其是柏拉图。从奥古斯丁以降,我们时刻能看到普罗提诺的影响。显然这并非由于对他的高贵气质和他的生活印记如同对他留下的著作和他思想的印记一样记忆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散播在希腊遗产中并产生了如此长久的影响。而且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早期教会的时代和基督教义的发展中。在现代性的开端即人文主义时期,普罗提诺的时刻又再次到来。那时人文主义者欲借助于希腊思想从教会正统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普罗提诺这个将古希腊思想传播到早期教会的思想家就再次成为合适的中介。马西琉斯·费西努斯(Marsilius Ficinus)将他译成拉丁文,那是在15世纪。进而言之,普罗提诺的思想构建了从那时起到最近时期的整个的柏拉图主义传统。瓦解这个柏拉图—普罗提诺的统一体的是19世纪历史意识的出现和历史感的发展。“新柏拉图主义”这个新术语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到现在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本质区别第一次被承认。甚至黑格尔这个柏拉图晚期对话的发现者和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真正完成者,仍然宣扬普罗提诺的重要影响。他将新柏拉图主义运动(他也这样称呼它)视为希腊思想的高峰。由于普罗提诺,希腊思想被带到了基督教真理的边缘。这一点不久即反映在19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中。它与黑格尔思辩哲学所宣称的他已从概念中发现了基督教世界的真理和“三位一体”的秘密的说法形成了冲突。那时普罗提诺和黑格尔被共同置于“哲学的真知”(费迪南·克里斯坦·鲍耶尔 Ferdinand

Christian Bauer)^① 的名号之下。“真知”(gnosis, 或译“诺斯”)仅指知识,但在基督教神学中“真知”这一概念是指一种错误的教义,即人通过知识并将它提升为神圣真理能够使自己从死亡和堕落中获得拯救。这是对启示宗教如基督教的直接挑战,这种情形使普罗提诺的思想甚至从宗教观点看也具有一种世界历史的意义。

不仅如此,这种伟大的哲学综合(它由于黑格尔而产生了影响)在普罗提诺的著作中得以完成,他的后继者们激发了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去建立他们的庞大体系。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以及思辩哲学都将它斥之为新柏拉图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即使我们完全无视它与观念史尤其是与德国哲学传统的这种联系,只要我们直接去阅读普罗提诺的著作和他生活于其中的传统,我们就会奇怪地被深深感动。回响在普罗提诺的著作中的沉思冥想是一种多么独特而内省的声音啊!那里边的言说者的确是一个教师,但他是一个被他的听者和学生在共同的精神迷狂中所理解了的教师。甚至今天的读者在听到这种声音时也会感到它犹如一个直达灵魂的秘密信息。直到今天仍有读者象读圣经一样去阅读普罗提诺的著作。普罗提诺在孤独中伟大。我们知道当今有许多文本非常接近普罗提诺的思想,我们也有将亚里士多德与普罗提诺相比的饱学宏论,但他们是一些多么冷漠的作家啊——学术大师、教义学家、形式主义者,以及那些蠕动在概念的蛛网中巧言令色以博学自炫的家伙。普罗提诺却完全不同。的确,他并非没有概念的精细和经院哲学的色彩,他的语言是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噶的伟大传统所形成的,因此也并非没有博学的前提,但是普罗提诺个人对于概念化的图解这种那个时代因之反受毒害的方式如此欣赏和痴迷,以至于他却能够独树一帜。他

^① 费迪南·克里斯坦·鲍耶尔,《基督教的诺斯》(图宾根,1853)和后来的,汉斯·约纳斯,《诺斯和晚期的精神》(哥廷根,1934) – 作者原注。

是一个天才的现象。

在历史的启蒙时期,人们也许已看到这种宗教的精神主义和超脱现实的理想,它以一种历史的方式表现出这一伟大思想家其思想的时代特征——即它表达了古罗马晚期的一种思想倾向,一种像雾一样笼罩了古希腊简洁明了的理性精神的思想倾向,它成为即将到来的基督福音的先声。但现在我们对此却另有看法。我们并不想否认在那个时期到处弥漫的宗教热情和思想家普罗提诺也浸淫其中。但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假设:这一宗教转折的结果是一些全新的、陌生的、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思想的东西产生出来。对于我们来说,哲学思想与宗教传统的关系似乎不应以如此简单的对照方式来加以描述。我们更愿认为,尽管古希腊启蒙思想在知性事业中不乏圆滑与激烈,但它与希腊宗教一直处于一种互惠的关系中。古希腊文学中的伟大戏剧表现出从很早开始诗与哲学就像两个斗士一样为了描写和再现古希腊世界的真实的宗教经验而搏斗。

本世纪初,荷马的神学仍被当作宗教思想最古老的源泉而被人们阅读。今天我们已不仅仅把它看作是对宗教的诗化重现,在那里简洁和理性,系统化的意识和对神秘主义的刻意忽视都被用于宗教传统中,仿佛它被变成了一种诗化的讯息。我们对爱奥尼亚人的胆量充满惊奇,他们居然对于事物的开端——对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非存在,对于操纵所有人和宇宙事件的系统的平衡——提出了伟大的问题。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战胜荷马神话中的宗教拟人论的呢?然而同时我们看到,这种对神话传统和神的音讯的持续不断的重新阐释,是与古希腊思想的启蒙冲动相伴而行的。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希腊的悲剧时代的哲学”,它与“悲剧的诞生”就有直接的联系。这一景象是受瓦格纳影响的尼采所坚决反对的。它是一幅失乐园的图画,但不完全像在诗与哲学中所表现的

希腊悲观主义的失败的乐园。它并不像尼采所认为的那样，柏拉图虚妄的道德乐观主义在这末世又汹涌而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并没有摧毁那个邪恶的苏格拉底（这是采用尼采的著名说法），相反，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遗产推向激烈启蒙的极端，并且又用希腊文化中的宗教传统的深刻真理将它们重新统一起来。启蒙与传统达到一种新的创造性的平衡。柏拉图的关于灵魂及其命运、诸神统治世界的神话通过奇妙的不同风格的混合显示出这种统一，这些风格中所表现出的神性语言的欢愉性质与爱奥尼亚人的反思精神融为一体。

通过取得这种平衡而获得的知识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目的论的宇宙。在那里人作为最接近神性的创造物，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但他们仍然与整个的宇宙秩序保持一体。在宇宙的本体秩序的顶端是一颗永恒的星座，它是一个不可变异的存在，像一个保护人和人类思想知识的典范，在喧嚣的芸芸众生的头顶熠熠闪光。一种高度发达的占星术始终与希腊民间宗教精神息息相通，它在托勒密体系的伪装下保持其合法地位达数个世纪之久，直到它被哥白尼这个大胆的托伦修士所摧毁。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提出在其时代最现代的占星学体系之后写道，他的祖先与后代都确信这些星座的非凡存在是神圣的。然后他又接着写道（《形而上学》A8, 1074b9 ff）：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论断本身就是神圣的。因为如果必须假设每一种艺术和知识都被多次发现——如果从总体上说——然后又隐没不宣，那么人们也许就会相信这种教条实际上是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古代知识的残余。在任何情况下，教父们和早期时代的信仰只是在可以认识的程度上而言的。

亚里士多德这个严肃持重的概念大师如是说。

如果我们思考这一具有宗教基础的思想传统,我们就会发现,它并没有被人为的修正与歪曲,从而让普罗提诺这一古罗马晚期的思想家去将柏拉图视为他的思想与宗教的典范。在希腊的整个理性历史上哲学与宗教具有共同的基础。当一个斯多噶派思想家如克利安西斯(Cleanthes)将他最著名的赞美诗献给最高的神时,他就此表达的他思想的真理与神话的真理一样多。如果说伊壁鸠鲁和他的罗马传播者卢克莱修(Lucretius)曾试图用精妙的逻辑去颠覆对神灵和死亡的恐惧,那么不管怎样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用对一个女神阿芙罗蒂特的赞美透露出他的启蒙思想。用这种方式甚至古代的无神论也与宣扬神圣权力统治古代生活的论调调和在一起。

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具有高度宗教热情的时代普罗提诺是同时一身肩二任:一个宗教的人和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普罗提诺也有他自己的苏格拉底,一个在哲学上启迪他的人:阿莫纽斯(Ammonius),这个扛麻袋的人生活显然俭朴无华,绰号因此得名。阿莫纽斯对柏拉图极有研究,却只字未写。普罗提诺是他最勤奋的学生之一,追随他如此辛勉以至直到很晚他才决定写下自己的沉思,并以此在罗马建立起自己的师生圈子。正是依赖波菲利的忠实记录,我们才有了他的整个生活,他的所有演讲。他的演讲就像是在与自己谈话:提问,打断,重新开始,提出异议,推演出最精妙的辩证法——直到演讲结束时并没有出现结论,答案或结果,而是一个思辨性的声音和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美妙场景。当然,只有达到希腊哲学文化高峰的人才能完全掌握这种辩证的精妙。不过,这种精采的景象和隐喻一次又一次背叛了思想家的想像力,再次将希腊哲学传统的总体变成了原创性的思想。

毫无疑问普罗提诺一次又一次抓住了柏拉图的主题,并用锐利的辩证法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在理念的多样性之上思想追索着

“太一”，它作为善本身和美本身，就如世界的一个本源，超越并降临到理念世界这个真实存在的王国。这也是柏拉图的思想。但在他的对话中柏拉图避免对“太一”或上帝这些必然是一同时也是多的概念作任何精确的表述，他对于诸如理念与表象的多样性关系如何，尤其是善本身和美本身与一切善和美的事物的关系如何，以及感觉世界如何真正参与到理念的可知世界之类问题，也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在他看来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几乎都具有宗教的意义，然而这些世界的相互对立并不像所谓的柏拉图主义的两个世界理论所说的那样平板与简单。诚然，上帝能成为存在的原因和基础的意义问题在善本身和美本身在存在物上总是存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消解。但是不像柏拉图，普罗提诺将他的全部思想都致力于将“太一”与所有定义性的界定区分开来，甚至将它与“思想”也完全区分开来；因为从其本质上说思想不能是“太一”，其原因在于思想分裂为思想过程和思想的两重性。他求索“太一”的否定性的思路使成为否定神学之父和所谓的否定论(*via negativa*)的先驱。思想只有理解为普遍否定它才能与神性的权威相抗争。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学，它在同样的意义上将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里的第一个“假说”译作否定神学的一个文献^①。

普罗提诺总是回到思考“太一”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这些基本难题。“诺斯”这个思考自身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曾用它来描述神圣存在的方式，它是不能自足的。相反，我们必须超越思想的两重性。作为善本身和美本身的“太一”在思想和思想过程的结合和流溢中存在。“太一”的这种超越性同时也意味着在所有存在物中“太一”具有最高的内在性。甚至当一个存在物不是一个思想着的

^① 关于这一点有意义的是普洛克罗(Proclus)对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的评论仅考虑了对话的第一个假说，因此以上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关于这一点参看我的《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及其影响》，见《全集》(图宾根，1991)，7:313–27。—作者原注

存在物时，“太一”的统一体在一切事物既是它自身又是一中昭示其自身。这样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弥漫性的“一切”。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生命和活力自我确证性地构成了神的基本本质，就像整个世界的基本性质一样。但是为了解释宇宙有秩序的运动，柏拉图这个彼达哥拉斯派的数学家求助于神话式的寓言。一个造物主根据不可抗拒的和谐律主宰着整个世界。不仅如此，关注生命远甚于数学的严肃的亚里士多德也设想过一个运动的秩序，它是由不动的运动者的神秘吸引力比如爱的力量来推动的。相反，普罗提诺却从一种新的意义上将生命的活力发挥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力量与可能性”($\deltaύναμις$)这一概念上，普罗提诺赋予它一种新的含意和某种本体论的首要性。当然 $\deltaύναμις$ 本质上与 $\epsilonνεργεία$ 相关，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些概念已成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但是在黑格尔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存在概念(埃利亚人的后裔以此安身立命，“存在”意味着在思想中在场的事物)获得了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必然性的意义：不在场，但是力量仍然保持和显示着自身。力量总是有生命的力量，它不是在表达中扩展自身同时又使自身在表达中受损。有生命的力量通过它活动的力量来实现自身和保持自身。我们也会说到流淌出来的力量，就像我们在戏剧和舞蹈中看到的从人身上流淌出来的生命活力。这一点还需我们从其整个的本体论意义上细加考量。斯多噶学派已经以适当的方式思考了力量、呼吸、张力这些新的概念。他们为存在思想的崭新转折铺平了道路。存在不再是流淌着的在场之物，它只以其可预见性而为思想所关注，就像理念、自然、物质；存在现在是潜藏于一切事物中神秘力量，它从不让自己被看见、被考验或被耗尽，只在自身的表达中展现自身。显然，造物主的观念——它对于柏拉图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

世界理性结构的一个哲学隐喻——从这样的存在概念中获得了更多的现实性。新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的存在思想注入了新的理解，主要体现在“流溢”这个著名的概念中，一条永不枯竭的小溪涓涓不停地流淌或流溢。^①它使整个世界的伟大结构成为一体。这些水流从最高的“太一”渐次流溢到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然后到能体验到自身的灵魂世界，然后到有机构成的自然界。

让我们来听听这一沉思风格的论述的其中一例：

“太一”必然是整个世界的本原，并先于世界而存在，这样通过它整个世界才能存在。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物，那么首先每一个存在物与其他物都是同一的，这样一切事物才都是一样的，或者说一切是一，差别才能消失。以此可推之，它不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先于整个世界。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整个世界的力量，没有它的存在，整个世界本身和作为整个生命原则的精神都不会存在。因此先于生命的是生命的本原。因为生命的活动(enactment)是整个世界，它根本不可能是原则。相反，它从一条溪流中显露自身。比如，想象一条小溪，它没有别的本源，它本身就是所有溪流的本源，这条小溪永不会枯竭，而是从自身继续流淌。这样那些从它流淌出去的小溪在它们流向自己的方向之前，在它那里仍是一体的。这样每一条小溪都象它过去一样已经意识到它将流向那里。或者想象一棵大树的生命从树尖流动到树根，以这种方式它在自身中仍然保持了它的本源，在流遍全身的过程中它并没有消散尽自己，好象在根部有它自

^① 比较我关于溪流概念的说法，见《真理与方法》附录5，约尔·文舍默尔和唐纳德·马绍尔译(纽约，1989)，501—2页。—作者原注

己真正的位置。这一本源给予大树全部的生命,但它仍保持着自身,它并不是多而仍然是多的本源。这毫无惊人之处,却仍然令人惊奇。(《九章集》iii 8(30), 9, 50 – 10, 14)

如上所见,普罗提诺喜欢那些表现有机统一效果和生命的隐喻,溪流的意象他总是随手拈来。进入他视界的还有大树的根须深入大地、树冠直指天空的强大的生命循环。尤其是“光”这个谜一样的意象无处不在,它也许是从一个光源流出,然而它每时每刻都在把自己播散到四面八方,用自己的光照亮一切,用自己的光在所有存在物上停留,并且捕捉到是其所是的一切。它也许会在虚无存在的地方隐没于无边的黑暗中,但是仍能从每一个存在中反射到自己的光辉。

熟悉里尔克的人立刻会意识到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激发了《杜依诺哀歌》中那种天使般的情景:

早熟的成就,你们是创造的骄子,
一切制作的顶峰,晨曦映红的
山脊,——繁华神祇的花粉,
光的关节,走廊,阶梯,宝座,
本质构成的空间,喜悦构成的盾牌,暴风雨般
迷醉的情感之骚动以及突然间,个别出现的
镜子:它们把自己流出来的美
重新汲回到自己的脸上^①。

^① 《杜依诺哀歌》,莱斯利·诺利斯与艾伦·凯利译(哥伦比亚, SC, 1993), “第二首”,9页。—作者原注。(这里采用绿原译文。—译者注)

这是流溢或流淌的喜剧的另一个方向：回归。在这里存在成为真实的存在：就像天使是更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情感又回到自身。

当普罗提诺的想象力构想出精神世界时，这种执着于“太一”的非柏拉图式的主题就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个精神世界从感觉世界中分离出来，给抬起头来审视宇宙基础的求索的灵魂以承诺。它像一出伟大的喜剧，思想的精神进路找到了自己的同道。从感觉世界上升到精神世界，超越精神世界的多样性而达到“太一”，善本身，美本身，这些思想完全都在柏拉图的精神领域之内，但这种上升是一种回归，是灵魂的相反之路。在它之前的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灵魂的流溢和存在从原本的统一体中而来的全部的多样性：一个不可思议的流出、流溢的过程，就像一个直管往前的行动，从中产生出的多样宇宙形式释放出来，成为存在。这种事物的秩序是由与“太一”的远近关系的规律所决定的。就像有一个光源，它的光被隐没在深重的黑暗之夜中，但只要它没有完全被黑暗所吞没，它就会显露出从它本身所流淌出的光线所及的东西，那些最明亮最清晰的东西是离它最近的，而最远的东西就是最昏暗的——这就是普罗提诺所描述的伟大的宇宙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迷失而渴望的灵魂试图去找寻他漂泊的此在的家。这一深入到宇宙戏剧本质的洞见之所以能提出，是因为哲学在陷入沉思的同时又引导被抛入存在的灵魂返回到“太一”的活生生的基础。

基督教的“诺斯”概念可以适当地用于这一思想。它并非是通过一个彼岸世界的上帝的启示，而是通过对个人自己的现世存在的深化与精神化而使救赎之路敞开。这促使迷失的灵魂与终极的基础结合的伟大的精神呼吸在吹拂着整个宇宙。对于“太一”这“神秘的统一体”的深刻沉潜只是标志着回归的最后的阶段。普罗

提诺的形而上学是存在通过返回到自己的本原而回归的学说。

我们聆听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语言。我们重温梅斯特·埃克哈特的话语：“‘你为何远走他乡？’，‘为了寻找回家的路。’”